

客家学术研究丛书  
主编 陈春声 罗 勇 王 东

# 传统客家村落社会研究

刘大可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客家学术研究丛书

主编 陈春声 罗 勇 王 东

# 传统客家村落社会研究

刘大可 著



SPM  
· 广州 ·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统客家村落社会研究 / 刘大可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4

(客家学术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218 - 11201 - 5


I. ①传… II. ①刘… III. ①客家人—村落—农村社会  
学—研究—中国 IV. ①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5107 号

CHUANTONG KEJIA CUNLUO SHEHUI YANJIU

传统客家村落社会研究

刘大可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出版策划: 钟 菱

责任编辑: 钟 菱 王红星 李春龙

装帧设计: 金 彤 吴长乐

责任技编: 周 杰 吴彦斌

插 图: 曹知博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9.5 字数: 275 千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 世界客家文库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朱小丹 吴伯雄 吴德芳 黄华华 曾宪梓

## 世界客家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桂科 杜传贵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 河 应中伟 张伟涛 张燕卿 萧宿荣

执行主编 肖风华 钟永宁

编辑部主任 钟 菱

## 世界客家文库学术委员会

主 任 陈春声

执行主任 陈支平 曹树基 罗 勇 王 东

学 术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幼楠 王琛发 庄初升 刘大可 刘义章 刘正刚 刘永华

刘志伟 刘道超 刘晓春 严修鸿 李如龙 杨宏海 杨彦杰

肖文评 吴庆洲 吴良生 张 侃 邱国锋 陈世松 陈弘君

劳格文 周建新 周雪香 郑振满 房学嘉 胡铁球 黄志繁

梁浩翰 谢有顺 谢重光 谭元亨 潘朝阳



刘大可（1968—），福建省武平县人。历史学博士，先后在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社会历史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副校长、福建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2002年被评为福建省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2004年入选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选，2008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出版《中心与边缘：客家民众的生活世界》《传统与变迁：福建民众的信仰世界》《闽台地域社会与族群文化新探》《闽台地域人群与民间信仰研究》《田野中的地域社会与文化》等专著9部，在《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获省部级以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1项，其中《传统与变迁：福建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心与边缘：客家民众的生活世界》分别获得福建省第九届、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 《客家学术研究丛书》总序

清嘉庆十三年（1808），执掌惠州丰湖书院的徐旭曾，受广东东莞、博罗一带“土客械斗”的触动，招集院内诸生，讲述客家源流及其语言文化。徐氏的讲述，后经门人整理，以《丰湖杂记》为名，收录在《和平徐氏族谱》之中。<sup>①</sup>在客家研究的学术史上，徐氏的这份讲述，“虽文仅一千余言，然颇能简明得要，且为最先提述客家源流问题的作品”<sup>②</sup>，故而一直被视为研究客家历史文化的先声。

以《丰湖杂记》为起始，客家研究已走过200多年的历程。200多年来，围绕着客家历史文化所建构的知识体系，可谓丰富而又饱满。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民族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纷纷介入，在多学科交叉与整合背景下的“客家学”建构，正在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实践。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在200多年来的客家研究进程中，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前者在继承和发展徐旭曾以来客家籍传统文人士大夫对于乡土历史与文化认同的集体记忆的同时，又立足于现代的学术规范，“以科学之方法，为客观之论述”<sup>③</sup>，从而首次以严谨的学术理路，对客家历史与文化作了系统的梳理和厘定，并得出了客家是汉民族中的一个系统分明的“民系”（或“支系”），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客家是由于

---

① 详请参阅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1965，第297～2199页。

②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希山书藏社，1933，第2页。

③ 朱希祖：《客家研究导论序》，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朱序，第1页。

历史上多次移民运动而引发的北方汉人南迁的产物等一系列重要结论。至于《客家源流考》，则主要是以客家谱牒文献为基础，进一步夯实前书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继罗香林先生之后，海内外学术界又推出了大量的有关客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成果。不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类后续的成果除了拾遗补缺之外，总体上都没有超过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的水平。一直到了90年代之后，随着民族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众多社会科学学科的加入，特别是随中国改革开放而来的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日趋频繁和深入，反思罗香林先生以来的客家研究传统，突破已有的以历史源流考证、方言特征描述和民俗事象举证为旨归的有限格局，一种全新的客家研究范式才开始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

正因为如此，在学术史的分期上，我们可以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客家研究，笼统地归入由罗香林先生所开创的学术传统。就研究范式而言，这一传统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从中国历史的整体进程出发，通过梳理北方汉族人口的几次大规模南迁，来辨析客家的渊远流变，再对客家的民族归属问题进行剖判；其二，在具体的研究策略上，主要是以零星的正史材料和地方志文献为经，以大量的客家谱牒文献为纬，通过这种经纬交织的文献铺陈方式，“再现”客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

“汉族移民史”范式主导下的客家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承传与发展，积累了大量的有关客家历史与文化的知识。但是，从学理的层面看，这一研究模式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严重不足。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这种宏观的“汉族移民史”研究理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同一部汉人南迁史背景下南方汉族又分化成不同方言文化群体的这一重要事实。众所周知，在今天的南方汉族人群中，不仅有客家这个群体的存在，而且还有吴、湘、赣、闽、粤等诸多汉语方言文化群。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在北方汉人南迁的这一共同背景下形成和发展

起来的。这一事实表明，仅仅从汉人南迁这个单一的移民史维度，是无法彻底厘清客家之所以成为客家、其他南方汉语方言群体之所以不同于客家的历史文化缘由。其次，这一研究路径在整体上漠视了赣南、闽西和粤东北这片毗邻区域（笔者称之为“赣闽粤边”）历史文化景观的独特性，漠视了该区域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与客家形成及发展之间的种种内在关联。数十年来，在“汉族移民史”的研究理路影响下，作为客家赖以生存与发展地理基础的“赣闽粤边”，一直以来只是一个“配角”，是接纳北方人口南迁的“容器”，是承载随北方人口南下而来的中原文化意识、文化观念和文化事物的“集装箱”。在这种“赣闽粤边”完全“不在场”的叙事模式下，客家就是一群“中原衣冠”辗转南迁、“雅不欲与土人相混处”<sup>①</sup>的“中原音韵”承传者、“诗书礼乐”传播者和“爱国保族思想”的勇敢实践者。<sup>②</sup>至于赣闽粤边区域内部的族群关系、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以及该区域与周边其他区域的互动等各种因素，对客家这个特定的区域性语言文化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一叙事模式之下，则一概阙如。

就主要研究策略来看，“汉族移民史”研究理路，主要立足于中国历史的宏观发展进程，经由对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北方汉族人口南迁过程的梳理，来厘清客家人的来龙去脉，一方面借以证明客家是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彰显客家人根在中原和忠义爱国的群体特性。显而易见的是，这一研究的核心关怀，一方面是力图化解自19世纪以来华南地区日益强化的客家人与周边其他语言文化群体之间的矛盾与紧张，另一方面又与20世纪初叶以来华南地区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相呼应。在这样的研究策略和核心关怀指导下，作为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晋室南渡、安史之乱、宋金对峙、蒙元南下以及清军入关等等，遂成为理解客家起源与发展的几个最主要的历史情节。相应地，所谓“中原衣冠”“义不帝秦”“诗礼传家”“崇文重教”等，便成为客

<sup>①</sup> 徐旭曾：《丰湖杂记》，罗香林编：《客家史料汇编》，第299页。

<sup>②</sup> 详请参阅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四至第八章。

家人或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围绕着客家历史与文化所建构的一整套叙事模式，包括在这一叙事模式之下所积淀起来的有关客家历史与文化的各种知识，都与上述这套话语体系密切相关。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纷纷介入，特别是经过中国史研究从原先的“宏大叙事”向中观层面的“区域史”路向的转变，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开始了对罗香林先生所开创的学术传统进行反思与检讨。正是在这一反思与检讨的过程中，客家研究进入了学术上的“突破”期。

这一时期所谓的“突破”，尽管体现在问题意识、研究理路、概念工具乃至具体方法等各个不同的面向，但由此前“汉族移民史”的宏大叙事模式，向“区域社会史”叙事模式的转向，则是这一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尽管就严格的意义而言，最近二三十年来所问世的客家研究成果，丰富而又驳杂，以至于我们很难用某种统一的理论范式来加以归类；但是，把客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以及客家文化的类型特征放置于特定的区域社会史的脉络之中，从区域社会的发展过程、人口流动、族群关系、生计类型、贸易网络、区域互动等各个不同角度，来理解客家这个特定的方言文化群体的形成与发展，辨析客家文化与周边其他区域文化的异同，则是这一时期众多研究者的共同取向。在“区域社会史”的脉络下，客家这个地域性的语言文化群体，就不再是一群行色匆匆的北方来客（及其后裔），而是赣闽粤边地域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研究的整体理路，是以赣闽粤边这一特定的地理范围及其相邻区域为基础，揭示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因素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构成区域历史或区域文化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及作用。它重在从区域内部的人地关系、族群关系以及该区域与周边其他区域的互动过程中，来理解地域社会的类型及其特征。与以往那种宏观的汉族移民史研究理路相比，这一研究路径所开凿出的诸多研究课题，所发展出的各种研究方法，所凝练出的各种理论诠释，不仅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

于客家历史与文化的认知，而且为推动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向纵深的发展提供了丰沛的学术资源。

正是基于对百余年来客家研究学术史的以上认识，我们在编辑这套“客家学术研究丛书”时，把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作为整套丛书的第一种。这样的结构安排，既是对百余年来客家研究学术史的尊重，更是对罗香林先生这份学术遗产的格外珍视。而整套丛书所希望重点呈现的，自然是最近若干年来客家研究界所贡献的一系列最新成果。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客家研究从19世纪中叶以来，就是一项世界性的学术事业。从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到当代欧美和日本的中国学研究界，关于客家人、客家历史及文化的研究，一直就未曾中断过。在最近二三十年来客家研究的发展与“突破”过程中，一些来自于海外的学术成果，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着手编辑这套丛书时，我们也曾考虑将海外学术界的重要成果加以收录。然而，由于这些成果大都是以外文出版或发表的，短时间内很难一一译成中文。故而，除梁肇庭先生的著作外，其他的成果暂时都未能编入丛书。这当然是非常遗憾的。我们殷切地期待译界朋友能尽快地将这些成果系统地译过来，一方面以嘉惠整个学林，另一方面也让这套丛书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和饱满。

是为序。

王 东

2018年2月1日

绪 论 /1

第一章 村落地理与布局

第一节 客家村落地名的发生及其意义 /10

第二节 传统客家村落的空间结构初探 /27

第二章 村落社会结构

第一节 传统客家村落宗族的形成与发展述略 /42

第二节 传统村落视野下小姓弱房的生存形态 /73

第三章 村落社会生活

第一节 《元初一》所反映的客家村落社会 /98

第二节 传统客家村落婚丧习俗述论 /112

第三节 传统客家村落的消闲娱乐 /124

第四节 客家村落妇女：族谱记载与田野调查的比较 /132

第五节 客家村落的通婚网络初探 /151

## 第四章 村落社会控制

第一节 传统客家村落的纷争处理程序 /171

第二节 科举与传统客家村落社会 /190

## 第五章 村落社会观念

第一节 神明崇拜与传统客家村落社区意识 /224

第二节 公王与社公：传统客家村落的保护神 /244

第三节 风水与传统客家村落文化 /260

后 记 /295



## 绪 论

从1995年秋冬开始，我随法国远东学院劳格文先生和福建社会科学院杨彦杰先生在闽西从事客家村落的田野调查研究。越明年，我又以闽西客家村落为研究对象，师从浙江大学历史系金普森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本书是从1997年开始至今，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撰写而成，大多数文章先参加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两岸客家高峰论坛及其他各类客家学研讨会，在广泛听取客家学同行意见的基础上，经修改后发表在《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台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民俗研究》《东南学术》《福建论坛》《福州大学学报》《中国方域》《客家文化研究通讯》《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福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这些论文因散见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刊物上，有的在时间上相差20年，而在空间上则相距数万里，一般读者往往难以通览，故应《世界客家文库》之邀约编辑成书。

本书内容包括五章：第一章从村落地名与空间结构角度考察了传统客家村落的生存背景；第二章则从宗族的形成、发展及一般结构和小姓弱房的生存形态，正反两方面分析传统客家村落的社会结构；第三章从衣食住行、婚丧节庆、消闲娱乐和女性视角，展现丰富多彩的传统客家村落社会生活；第四章从纷争处理、科举应试等角度讨论传统客家村落的社会调控，以及宗族、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五章则上升到观念与思想意识的层面观察传统客家村落的信仰世界。全书力图从不同侧面展开对传统客家村落社会的崭新探索，因此这些篇章在内容上虽相互关联，但不追求系统全面，选题上多针对此前没有探讨或探讨较少的内容，借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而在方法上，则采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相结合的办法，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深入前人没有或很少有人进入的现场进行观察、参与、访谈、

体验、感悟，将文献的记载与鲜活的口头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sup>①</sup>以田野调查新资料探讨村落社会新问题，似乎也顺应了当前国内外的学术新潮流。

由于“村落”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概念，所以“村落社会”研究包括历史、社会、宗教、民俗、经济、政治、地理等多个领域。因此，在学科方法上就迫切需要实行“科际整合”。在国际学术界，现代跨学科运动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一战”到“二战”，以一些初级讨论为主要特征；第二个时期是从“二战”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出现了一些涉及面比较广、影响比较大的跨学科运动；第三个时期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一些专门性的跨学科活动脱颖而出，形成了“跨学科学”的新研究领域。如在法国，以年鉴学派为主的史学家坚持同各门社会科学的交流和对话，注意多层次地把握和揭示历史发展过程。到20世纪60年代，法国史学家借鉴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抛弃了以政治、军事以及杰出人物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史学，广泛开展了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此后，法国史学的跨学科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几乎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所有主要学科建立了联系。

在台湾，20世纪70年代初张光直主持的“台湾省浊水、大肚两河流域自然与文化史科际研究计划”（简称浊大流域人地研究计划），也聚合了地形学、地质学、民族学、考古学、动物学、植物学、土壤分析七门学科的学者进行综合研究。1988年成立的“台湾史田野工作室”，亦是以历史、语言、考古、民族等学科科际整合为特点。台湾人类学家甚至呼吁：在研究中国社会时，人类学家“非向历史学借方法不可，否则很难了解中国社会”<sup>②</sup>。

而在大陆学术界，将科际整合方法运用于村落社会研究的论著则极少见。因此，本书各章尽可能地采用多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尤其是历史学与人类

---

①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历史语言研究集刊》1930年第1本。

② 庄英章：《人类学与台湾区域发展史研究》，台湾史迹源流研究会1992年版。

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村落社会进行总体的研究。

村落社会研究至少应包括三个基本领域，即村落社会志、村落社会论、村落社会史，它们又各有自己的支系，共同组成一个较完备的研究体系。其中，“村落社会志”是研究的基础，“村落社会论”是总体系中的主体，而“村落社会史”则是对村落社会研究的总结与深化。这三个基本领域类似于历史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基层史学、中层史学、高层史学。<sup>①</sup>村落社会志对应于基层史学，在基层史学中，史学家所达到的历史性认识，可以通过史料的直接连缀来加以表现，往往没有借助理论的必要，拙著《闽西武北的村落文化》及其续本《中心与边缘：客家民众的生活世界》当属此例。村落社会论对应于中层史学，在这一层次的研究中，史学家所达到的历史性认识在时空上不再被限制在短时段和小范围，而是在一个较广阔的范围来观察历史，这就需要进一步确立史实间的联系，探讨历史事件的时代背景，甚至作出定性的时代划分，理论分析开始出现，本书《传统客家村落社会研究》有此类似一面，但并非严格的史学著作，而是兼采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三门理论与方法的综合之作。村落社会史对应于高层史学，当中层史学扩大为一个更广阔的范围，从整体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对历史的演变作概括性的说明时，或者进行地域间、国家间、社会间甚至文明间的历史比较时，抽象与概括以及建立一般法则和理论模式的方法就成为必不可少，从而进入一个更高的认识层次——高层史学，拙稿《武北：一个传统客家村落的社区史》似属这一范畴。村落社会研究体系的建构，不仅是丰富学理的努力，也是对研究实践的引导。其理论的完善与研究实践的深入，是建设“村落社会学”的一种艰辛探索。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大都以具体的村落为考察对象，参与和观察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与文化现象，撰写出详尽的报告，但是详细的微观描述往往忽略了对人类整体历史规律的探索；而历史学家对府、州、县大范围的历史规律研究却又忽视了微观的探讨，往往失之笼统。20世纪30年代晏阳初首创以“县”为基本单位从事乡村实验研究和近年来劳格文以“乡”为考察

---

<sup>①</sup> 李开元：《史学理论的层次模式和史学的多元化》，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23～24页。

单位<sup>①</sup>，结合了前面两者的长处，在学理上具有很大的意义。但以行政区划为考察研究单位又容易割裂村落社区之间历史、文化、地理的有机联系。因此，我们认为在研究对象上应尽可能地选择自然—生态条件大体相同，属于同一水利系统，且当地居民具有高度认同感和凝聚力的介于“县”与“乡”之间的社区。这种社区又被人们视为一个与其毗邻社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如丁荷孙、郑振满研究的莆田江口平原，本书重点研究的“武北”等。<sup>②</sup>所谓“武北”，是指位于福建省西部山区武平县的北部。由于受武夷山脉走向的影响，在武平县城以北约 10 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名叫当风岭的高山。这座高山使得武平县南北交通困难，声息不畅，也使得武平县北部地区长期处于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在武平县北部区域内部，不仅自然—生态条件大体相同，而且同属于汀江支流桃澜河流域，而长期的历史发展又使该地区内部各个村落社会经济联系紧密，经济水平接近，社会风俗相似，具有高度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因而该地区被人们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社区——武北。武北现有 49 个行政村，分别隶属于 4 个乡镇——永平镇、桃溪镇、湘店乡、大禾乡。其中属于永平镇的有：帽村、昭信、中湍、唐屋、恬下、龙归磔、瑞湖、沟（钩）坑、杭背、田背、岗背、孔厦（下）、梁山、塔里、朝阳；属于桃溪镇的有：桃溪、亭头、新磔（含定坊、磔下自然村）、田雁、新田、鲁溪、新贡、湘溪、湘坑（含罗坑自然村）、洋畲、湘里、小澜、新华、新兰；属于湘店乡的有：尧山（含尧里、郑屋坝自然村）、三和（含山背、白竹陂自然村）、湘湖、湘洋、七里、店厦（含大化、牛湖下、浪下、河口、罗屋、吴潭自然村）；属于大禾乡的有：大禾、湘村、大磔（含大禾坝、磔迳自然村）、源头、龙坑、邓坑、上梧、上湖、贤坑、帽布、坪坑（含小平坑自然村）、山头、大沛。以这种特定社区为考察对象，一方面比较容易理解各个村落和社区社会、经济、宗教网络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属于一个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可望在研究过程中进行地毯式的田野调

① 劳格文：《中国农业社会结构与原动力》（未刊稿）。

② 参见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会空间秩序》，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丁荷孙：《莆田平原的神谱演变》，中国的祭仪音乐与戏剧及其社会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山西太原，1997 年 6 月。刘大可：《武北：传统客家村落的社区研究（1259—1949）》，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0 年。

查，尽可能地避免以偏概全的失误。

在以往的村落社会研究中，研究者是男性，受访者也大都是男性，所描述与论述的对象更是“男性”——男人影响社会生活，男人决定、组织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节日，女性几乎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色。与男性角色相比，女性角色作为个体行动者的形象在以往的研究中是无声的和边缘化的，其主体性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女性角色研究不但其重要性一如男性，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具有其不可替代性。一方面村落社区的不少社会活动，如生育礼仪、婚嫁习俗的特殊环节、性的教育等，仅限女性参加，由此形成的社会网络也是女性的；另一方面，一些传统的习俗在男性角色的活动中已消失殆尽，而在女性角色的活动中却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一些女性祖先、女性神明的传说有时甚至成为考察特定村落社会历史的突破点。有鉴于此，本书多篇内容加强了对女性角色的关注。

如前所述，本书在具体方法的运用上，较多地采用历史学的“文献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和社会学的“调查法”。所谓“文献法”，主要包括收集文献的方法和鉴别文献的方法。收集文献的方法又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调查采访；二是藏书摸底。调查采访需要做到实地采访、及时采访、跟踪采访、广泛采访。藏书摸底则需做到图书馆摸底、博物馆与档案馆摸底、区乡村档案摸底、私家藏书（含往来书信、文书）摸底。而鉴别文献的方法则主要是指考证。考证又称考据，是我国学者占有史料的传统方法，包括搜集、比较对勘和归纳演绎等过程。它始于先秦孔门，盛于宋，大盛于清，更盛于近世。这种方法对于村落社会研究的资料运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村落社会研究最基本的文献是族谱。以往人们大多认为族谱所记为本家、本族、本土之事，一般比较可靠。但是，族谱大多为本族、本姓的乡村知识分子所编修，他们最容易受到门第、宗族竞争、祖先崇拜等观念的支配，从而对宗族历史上的不少内容进行附会与建构。兹举三例，以见大概。

其一，据福建省上杭县《黄氏源流家谱》记载，黄氏第119世峭山公曾对21位儿子这样教诲：“骏马登程往异方，任从胜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旦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唯愿苍天垂保佑，